本版编辑：李少军
E-mail：t6@studytimes.cn
Tel：010—62806049

书海泛舟

抓住我们心中的那条大鱼

——读《老人与海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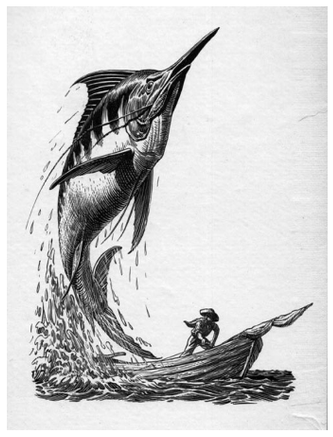
□ 周　鹏

2015年9月22日晚，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，在西雅图晚宴演讲中谈到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并称赞其“对狂风和暴雨、巨浪和小船、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”。《老人与海》自发表以来，在世界上广泛拥有不同语言、不同肤色的读者，是20世纪世界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。《老人与海》之所以闪耀着跨越时空、超越国度、富有永恒魅力、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丰富的哲学意义——富有生命的形象和深刻的寓意结合在一起，在海天之间烘托出人类永恒的尊严与无畏的勇气。

《老人与海》大致是讲老人桑提亚哥在数月没有任何收获之后，独自出海，捕获了平生最大的鱼，但在归途遭遇鲨鱼，大鱼被分食殆尽，最终老人带着疲惫和伤痕回到小屋，昏昏睡去。如果单独看故事的主干，这似乎是一出悲剧，意味着生命里的奋力挣扎最终仍是徒劳，暗示着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渺小。但是当我们细细读完故事，回味它字里行间充满的生命的感动以及丰富细节背后的隐喻，我们感受到的格调却是昂扬向上的——这是一曲英雄在暮年，寻找自我、救赎自我、升华自我的赞歌。

故事的主角是老人。他是一名年老的水手，有着一双永不言败的眼睛。他年轻时曾航行于大西洋，看过非洲陡峭的海岸、平缓的沙滩，以及沙滩上沉稳雄健的狮子。他年轻时曾与一位黑人好汉进行过一场持续了一整天的扳腕比赛，并最终得胜而归。但如今，妻子已经离世，自己孑然一身；两手空空，家徒四壁，在过去84天的时间里，没有打到一条鱼。曾经的辉煌和青春，都离他而去，似乎只能在梦中追忆。就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一个黑暗的清晨，他独自出海，要在这大海里找回属于他的尊严和荣耀。

故事另一个主角是大鱼。它是一条漂亮的大鱼，有着淡淡薰衣草颜色的肌肤，长长的比大镰刀刀刃还要高的尾巴，还有庞大的身躯和紫色的横纹。它是“优雅的”“精致的”“光荣的”“伟大的”。它能拖着小船在海洋上行走两天两夜，它比老人捕获过，甚至听到过的最大的鱼还要巨大。



它自由而又骄傲地畅游在深蓝色的海洋中，它在等待着某个人的到来。

在海洋无边无际的怀抱中，随着大鱼的尾巴拨开水底的平静，人和鱼迎来了一场久违的邂逅。在海与天的世界里，星与月的疆域下，人和鱼进行了一场光荣而激烈的对决。面对生活的各种不幸，老人不顾衰朽之躯，以高傲的姿态在对决中奋力拼搏；面对自己的猎手，大鱼以巨大的力量展现出惊人的镇定和高贵。在生死相搏时，鱼是值得尊敬的对手，老人想：“鱼啊，你这是要我的命，但你有这个权利！”“来吧，把我干掉吧。不管谁干掉谁都可以。”在马拉松似的拉锯过程中，鱼是老人口中喃喃的“兄弟”。老人想：“它可以供很多人食用，但那些人配吃它么？不配，当然不配。谁也不配吃它，它是那么优雅，那么出色。”最终，老人杀死了鱼，那一鱼枪，准确地击中了大鱼的心脏，大鱼高高地跃出水面，全身都露了出来，显得非常雄壮和美丽。

人活着，鱼死了。但胜利究竟属于谁呢？老人有些恍惚地看着绑在船边的大鱼，感觉这也许是场梦。回家的路上，他有些糊涂了：“是它带我回去，还是我带它回去？”或许在那个瞬间，老人回忆起了自己，海与天的交错间，大鱼幻化成了老人在暮年渴望去追寻的自己——那是搏击在惊涛骇浪中，无所畏惧的水手；那是胸怀梦想，远涉重洋的探险家；那是青春健壮，充满蓬勃力量的年轻人。在生命的较量中，老人在大洋的深处找到了自己，抓住了他，把自己和他绑在一起，踏上了归家的路。那一刻，青春和梦想再次在老人的身体里迸发出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老人驾星舸泛沧溟象征的是一趟面对苦难时的自我求证之旅，是一场精神上自我救赎的仪式。它证明了是人自身蕴藏的力量，而并非是其他什么东西，让人在命运前尊严而高贵地活下去。

生命毕竟是单向的，“天可补，海可填，南山可移，日月既往不可复追”。但是生命的伟大与永恒却在于，真正的勇士或许会被命运和时光所消灭，但却不可能被打败。生理上的衰朽，绝不代表精神上的绝望。老人在海洋中梦幻之旅，让他重新找回了精神上的寄托，同时在读者心中产生一层又一层的心灵激荡，这种悲壮与崇高向我们揭示了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。在故事的最后，老人又与邻家的男孩计划重新出海，而梦中，疲惫的他，又梦到了狮子，那些雄健的狮子……

《老人与海》就是用这样的多重隐喻，在重重迷雾中将我们推上精神的高地，让我们俯瞰命运和时间的长河，激励我们在波涛汹涌的长河中勇于拼搏，抓住那条属于我们自己的大鱼，支撑我们毅然决然地不断前行。或许这正是这本书值得我们反复品读的魅力所在。

庶　富　教

□ 钱　逊

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“庶矣哉。”冉有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（《子路》）

这是孔子的政治纲领，第一要使人口增长，第二使人们富裕，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。在当时，地广人稀，生产力低下，物产匮乏，要富国强兵，抵御外来的侵犯，首先要增长人口，有足够的数量。这是一切有见识的政治家共同关心的问题。墨子说：

天下贫，则从事乎富之；人民寡，则从事乎众之；众而乱，则从事乎治之。（《墨子·节葬下》）

他提出的富、众、治三点，前两点与孔子所说富、庶相同，不同的是后面这一点，一个主张教，一个主张治。

在富和教的关系上，富在教之前，先富后教。《论语》里孔子对这一点没有进一步作具体的发挥。但是《论语》中有很多地方谈到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心。

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（《学而》）

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？”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（《颜渊》）

鲁国遇到灾荒，国家的财政出现问题。哀公问有若怎么办。有若建议把田赋制度改一下，从征收二分之一的赋税改为收十分之一。哀公说，现在我都不够用，怎么你还要我减少到十分之一呢？有若回答说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如果老百姓富足了，你国君就不用发愁；如果百姓都不够用，你从哪里去征收呢？有子是着眼于让百姓能够富裕。民富国强，民富是国强的基础；只有百姓富足了，国家才能富强。

还有，“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（《季氏》）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应该是“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”。“均”，一般人常常解释为平均，说孔子是主张平均主义。其实未必如此。朱熹注说：“谓各得其分。”董仲舒则解释说：“孔子曰：不患贫而患不均。……大富则骄，大贫则忧；忧则为盗，骄则为暴，此众人之情也。圣者则于众人之情，见乱之所生，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，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，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。以此为度而调均之，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，故易治也。”（《春秋繁露·度制》）这些解释，都以为孔子所说的“均”不是平均，而是要调节各阶层的收入，使贫者富者都能“各得其分”，不至于过富和过贫，以求社会的安定。也是体现了各得其所的意思。所以这一章的大意就是不怕财富不多，只怕分配不合理；不怕人口稀少，而怕境内不安。也反映了孔子关心民生的思想。

名篇欣赏

（“孔子的治国理念”③）

书而思

到历史深处感悟秦楚兴亡

□ 丁国强

《秦崩：从秦始皇到刘邦》《楚亡：从项羽到韩信》是两本耐读的历史笔记。作者李开元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担任田余庆先生助教，从事秦汉史研究工作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没有囿于学术论文的固定套路，而是将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，用行走访问去体味当年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，冲破概念束缚，矫正历史错觉，用超越学院写作的历史叙事，给我们呈现一个活的人间世界。

历史是一堆往事

李开元沿着司马迁的足迹去踏勘古迹、采风访古，用想象和诗情去填补历史的空白。历史留下了许多探究不尽的谜团、回味无穷的蕴含。在李开元看来，历史就是一堆往事。这些往事虽然相隔久远，却在心灵和情感上离我们距离很近。命运的变迁、人生的结局、歧路的选择，那种痛苦、迷惘和宿命感都令人感觉何其相似。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他的人生地理，既记录着他们的活动轨迹，也潜藏着成败的玄机。

历史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，也是一个叙事结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历史是历代人的记忆、感怀和传说，抛开特定历史情境的过度阐释，只能给历史涂上一层伪饰。历史原本就是存在山水之间的，把历史囚禁在书面之上，只能把自己锁在语言的牢笼中。汉台遗址，古风尚存；淮阴城里，雄心犹在。李开元说：“历史的真实，常常是零零散散，在不引人注目之处，本来不是热闹的地方。”“溯源历史，追述先祖，明了今我的由来，是植根于人类本性的思路。古代社会，先祖与神明一体，是今我的保护和精神依归。”历史是一种基因、一种精神线索，沿着历史踪迹能够找到许多经过岁月洗涤、时间冲刷的真东西，其中的真知灼见、真情实感往往是今天的人们所容易忽略的。

历史是一种生命存在方式。历史性是人性的基本方面，省察历史，就是对人自身的审视和反思。历史叙事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言说历史，感怀历史，在与古人游中体味历史沧桑、感受当下存在，从而展开一段深刻的精神历程。李开元变研究历史为书写历史，从历史材料中探出头来进行自由呼吸，这是历史写作的一种革命。研究者要有写作意识，要有文体自觉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冲破学术论文的条条框框，才能突破层累形成的曲解误读。《史记》开创了历史言说的叙事方式，司马迁重视民间传说的搜集，那些关于神奇人物、神秘事件的种种传闻都是历史叙事的一种方式。李开元说：“历史不仅是往事的记录，也是对于往事的解读。”历史真实最终通过叙事得以呈现。历史叙事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叙事，是历史逻辑与心灵逻辑的叠合。后现代主义认为，历史事件与实践随实践而流动，是碎片化的，具有不确定性。李开元对这种碎片化叙事抱以高度警惕，虽然往事留下的信息往往是只言片语，但是，只要用合理推测和想象去填补史料空白，就会梳理出一条精神线索，表达出某种价值判断。

历史往事不是臆想，不是假设，而是一段顽强的记忆，它不仅存在于过去的时间之中，而且也存在于口述、文献、遗物之中。李开元为寻找秦朝崩亡的遗迹，来到秦二世戮死、砥死诸公子的上焦村，在落日黄昏、山阴地冷之时感受骨肉相残的悲哀，“飂飂间仿佛有鬼哭神泣，不散的千年冤魂，浸染得月冷星寒”。这些冰凉的文字构建了一种历史语境，极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。历史是客观的存在，并不是个人内心体验的产物，但是，历史中有悲喜，有长吁短叹。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历史事件的精神现场，去还原历史的来龙去脉，也是抵达历史真实的一种方式。

历史是最深刻的地理

李开元十分重视对历史遗迹的考察，他以强烈的地理意识进入历史，他认为，“地理是解读历史的钥匙，没有明确的空间关系的历史，宛若一锅迷糊的酱汤，不辨东西南北，始终晕头转向”。地形决定着军事形势、权力形势，关系着战略和转机。当然，地理条件不是全部因素，必须要结合当时的世事人情才能理解历史的走向。地理里面所隐含的历史规律是丰富而复杂的，其中不乏难以参透的历史玄机。司马迁说，“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，盖若天所助也”。

《秦崩》《楚亡》贯穿着对秦汉遗迹的造访。李开元叩访信陵君故宅、夷门故址、芒砀山、坑儒谷、大泽乡、咸阳宫、淮阴老街、漂母祠、汉台、龙门、荥阳城、成皋台、鸿沟、乌江、垓下城等古地，去获取身临其境、触景生情的历史体验，进行现在与过去的对话。历史遗迹不仅是兴亡成败得失之迹，也是察风俗、识古今、通人情的思想空间，更是慨叹英雄迟暮、美人凋零、人生苦短的感伤之地。李开元发出如是慨叹：“历史不可以回转，历史却可以体验，现场考察的实感，可以超越时空，再现历史的影像，诚然信矣！”回到历史现场，回归历史地理，是读史方式的革命，体现了主体意识的自觉。中国古代文人把读史放在经术之后，将经术中的义理作为判断和评价历史的标准。黄庭坚说：“要以经术为主。经术深邃，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，遇事得失易以明矣。”这种读史传统造成了读史主体的迷失，谁在历史现场？谁在追问、谁在沉思、谁在抚今追昔？李开元说：“历史需要不断地再叙事。只有再叙事，才能重回历史现场，让历史复活。”让历史叙事者以自己的方式去体悟历史、表达历史，历史书写才不会千篇一律、千孔一面。

李开元从沛县的山川地理中探究刘邦的帝王英雄的成长轨迹。丰邑是刘邦取天下的根基之地，刘邦身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丰邑情结。李开元似乎在向读者暗示：读懂了沛县，也就读懂了刘邦。沛县生活似乎是汉高祖生活的原型，深深打着刘邦的性格烙印，决定着他的命运结局。因此，要读懂汉史，首先要读懂沛县风土人物。秦始皇的严密统治并没有彻底扼杀底层的自由和抗争，沛县便是滋长抗争与自由之地。

楚汉之争充满了地理智慧。韩信暗度陈仓，巧妙利用古汉水水系，由汉中还定关中，创造了军事上的奇迹，也使刘邦集团获得了战略主动。地理设计了历史，改变了历史。彭城之战，刘邦虽然惨败，却夺得了关中及关东部分地区，处于进可攻、退可守的有利地位，项羽失去了主宰天下的绝对霸权，为垓下惨败埋下了伏笔。关于徐州的地理重要性，清人顾祖禹有言：“淮甸者国之唇，江南者国之齿。”守淮之道，既是用兵之道，也是谋大事之道。韩信的背水之战，既有兵法，又有地理上的较量。李开元认为太史公太浪漫，“著《史记》没有《地理志》，《史记》中的交通路线、地名地理的错乱比比皆是”。司马迁过于迷恋宏大叙事，执着于“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以至于忽略了地理上的细节。其实想想，司马迁的这一疏忽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错误，因为地理上的种种精打细算，似乎都逃不过“失人心者失天下”的定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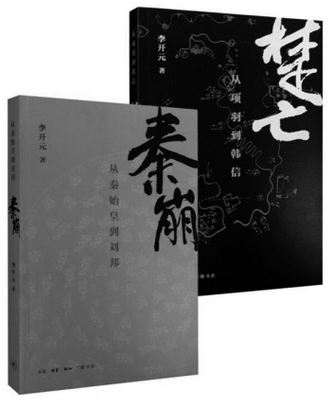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是一种相遇

刘邦在咸阳修建阿房宫时撞上秦始皇盛大出行场面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“高祖常繇咸阳，纵观，观秦皇帝，喟然太息曰：‘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也！’”李开元认为，这次偶然相遇，不仅给刘邦留下了永远不曾磨灭的印象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将来的历史进程。秦始皇的君临天下的风采给刘邦以强烈震动，也激发其政治抱负。这一视觉事件最终演变为心灵事件。一个工地上的服役者因这次相遇改变了人生走向。在后来的战国复活的大潮中，刘邦之所以不甘于为王，一心一意要做皇帝，也与这次相遇播下的皇帝梦密不可分。项羽与秦始皇的相遇，也是司马迁所津津乐道的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这样描述：“秦始皇帝游会稽，渡浙江，梁与籍俱观。籍曰：‘彼可取而代之也。’梁掩其口，曰：‘毋妄言，族矣！’梁以此奇籍。”秦始皇对这两次引发心灵震动的相遇浑然不觉。反抗的种子悄悄萌发于遥遥相望的一瞬间。

赵高与李斯的相遇，原本是一种博弈、一种较量，但最终化为李斯的一声叹息。李斯最终无法阻挡赵高的夺权计划，沙丘之变把李斯的帝王之术送上绝路。李斯与赵高都是入世求功利之人，前者通过学以致用，后者则不择手段。在卑鄙无耻的赵高面前，李斯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变成了一腔废话，而赵高与李斯的对话本来就是不平等的，几近于胁迫。从厕鼠到仓鼠，李斯官至丞相，爵封列侯，却最终无法逃脱小人的暗算。

秦帝国的速亡，源于严刑峻法、劳民过度而导致政权机器运转的急促和紊乱，频繁的徭役和出征，使“国家和人民陷于超负荷的泥潭”。苛暴的秦政制造它的掘墓人。反秦是从战国时期就开始累积的力量和情绪。吕思勉说：“六国夷灭，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，心上是不服的，满怀着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，一有机会，就要乘机而起了。”所谓“亡秦必楚”是说不尽的历史恩怨，也是秦汉史最耐人寻味的话题。民国才子张荫麟在他唯一专著《中国史纲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始皇能焚去一切《诗》《书》和历史的记录，却不能焚去记忆中的六国亡国史；他能缴去六国遗民的兵器，却不能缴去六国遗民（特别是一班遗老遗少）的亡国恨；他能把一部分六国的贵族迁到辇毂之下加以严密的监视，却不能把全部的六国遗民同样处置。”当上上下下人心离散，秦崩便是历史注定的结局。

《秦崩》《楚亡》凝结了若干个历史性相遇。韩信经过淮阴街市的胯下之辱，也是一种相遇。带剑独行的韩信从恶少胯下穿过，创造了忍辱负重的经典一幕。萧何追韩信，也是一种相遇。寒溪夜涨，成就了一段识才用将的佳话。晚近后人在拜将坛遗址题诗：“沛公帝业今何在，不及淮阴有将坛。”这段相遇最终以“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”终结，让人唏嘘不已。



书名：《秦崩》《楚亡》（全二册）
作者：李开元　著
出版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　2015年8月

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》2015年第5期要目

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与人权进步

“二战”以来中国在推动国际人权方面的贡献
［荷兰］汤姆·茨瓦特

新中国处理日本战犯的成功经验及中国对国际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——过渡司法的视角
朱力宇　熊　侃

基于人权的发展观之证成
王若磊

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

体制性改革与结构性改革
韩庆祥　张艳涛

总体性视野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
何建华

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与价值哲学创新发展
朱辉宇

政治学

当代中国民商阶层政治文化分析
张　伟

级差政治信任的形成机理、风险及改革思路——基于压力型体制的一种分析
上官酒瑞

法学

论中国古代德法互补的法文化
张晋藩

经济学

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发展驱动转型与制度治理建设
田国强　陈旭东

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：目标、路径及战略
戴　翔　张二震

社会学

当前我国重大社会矛盾冲突的新型特征
朱　力　纪军令

乡村社会治理创新：现实基础、主要问题与实现路径
陆益龙